

文学一、二期“黄埔”

——文学讲习所的回亿

□苗得雨

文讲所一、二期,各两年,是最正规的两期。人们愿意说,那是一、二期文学“黄埔”。

新中国成立不久,也是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不久,中国文联与文化部就着手建立起培养青年作家的最高学府——中央文学研究所。1953年秋二次文代会时,文联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正式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次年2月,中央文学研究所便改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仍受中国文联与文化部双重领导。就事物的延续性来说,文讲所是延安鲁艺的继续;新时期以来的鲁迅文学院,又是文讲所的继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大事,文研所的建立,可以说是开头几件大事中的一件。它深远的历史意义,一直在显示着。

第一期是1950年至1953年,第二期是1953年至1955年。这两期是正式的科班。我是第二期的。以后是两期短训班——也叫讲习班。我们前两期学员,是工作调动性质,行政与党的关系都带去,结业后再行分配。第一期学员53名,第二期学员43名,中间有跨期的研究班学员24名,相加共107名。第一期有的一边学习着,一边成了工作人员;跨期的有的转入第二期,有的也成了工作人员,实际上两期主要学员各40余人。这两期学员,大都在战争时期开始写作,有的已经有了一些名气。如第一期的马烽、西戎、李若冰、唐达成、陈登科、徐光耀、胡正、王雪波、杨润身、陈森、李纳、胡昭、古鉴滋、刘艺亭、孙迅韬、张学新、陈孟君、李方立、张德裕、徐刚、潘之汀、玛金、丁力、王谷林、王景山、葛文(田间夫人)、段杏锦(马烽夫人)、王慧敏(又转为二期)、丕波等,其中不少成了工作人员。如我到后,马烽任副所长,徐刚任教务处副主任,丁力、玛金、王景山等任教师,王谷林、潘之汀、王有钦等任别的职务。第二期的学员有玛拉沁夫、邓友梅、张志民、白刃、白艾、和谷岩、王丕祥、刘真、董晓华、谷峪、谭谊、赵忠、刘大为、李涌、孙肖平、张璞、金剑、缪文锦、魏连珍、胡海珠、贺贺钧(抒玉)、李强、漠南、周行、申德滋、吕亮、刘超、胡尔查、孙静轩、苏耕夫、钱锋、羽扬、李赤、张凤珠、赵郁秀、李宏林、颜振奋、李中耀、唐仁钧、肖慎、郭廷宣、周基、我等。第三期即1956年上半年那期讲习班,学员60人,是从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代表中选留的,有吉学沛、曲延坤、阿凤、李学鳌、胡万春、流沙河、阎一强、梁信、钟艺兵、尹一之、任大霖、谢璞、王剑青、胡景芳等;1956年下半年一期讲习班学员99人,主要培训文艺编辑,有韦丘、雷奔(宋奎)、阿红、刘燕及、苗凤浦、康志强、赵炳南、吕日生、陈椿年、高歌今等。以上经过培训、深造的,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50余年中文学生力军的活跃部分,创作多有突出成就,不少还担任过全国及各省市文艺单位的领导人。

文讲所——文讲所的建立,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是周总理亲自指示中宣部督办的。周总理主持的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批准了以丁玲同志为主任的筹委会,张天翼为副主任,委员有沙可夫、李伯钊、何其芳、黄药眠、田间、康濯与陈企霞。第一期开学典礼时,郭沫若、茅盾、周扬等都到会祝贺并在后来担任过讲课老师。这一期来讲课与谈创作经验的还有郑振铎、老舍、艾青、刘白羽、柳青、赵树理等。对学员作具体

辅导的除了所内领导丁玲、田间、康濯,还有张天翼、周立波等。

文讲所的学习,包括政治理论学习,业务学习(中外文学史、文艺理论、作家和作品研究)和创作实习。自第二期起更加系统,除原有的范围,又增加了“文学概论”、“中共党史”、“世界近代史”等。作家辅导也更具体化,如丁玲、张天翼、康濯、马烽、赵树理、刘白羽、严文井辅导小说组,光未然、宋之的、陈白尘辅导戏剧组,艾青、田间辅导诗歌组,每人辅导谁又都一一列明。第一学期,研读中国文学,第二学期研读外国文学,第三学期重点研读鲁迅作品,第四学期研读《红楼梦》。研读重点有小组范围的,有全体的。全体的都有大组讨论数天,如第一学期讨论《水浒》,第三学期讨论鲁迅作品,这两个内容的大讨论,大家的发言写出的文章,印了厚厚的两大本。我的论文《关于宋江》是根据《水浒》研讨发言整理而成,发在《文史哲》上。编者孙昌熙老先生说:“我以为你也是个老先生,想不到还是个小伙子。”外国文学重点讨论了莎士比亚戏剧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等。每学期末,学员还各写一篇学习论文,所内领导与教师们阅读后打分。四个学期的学习,日程早就排好,如第一学期,周一学文艺学,周三学政治,周二、四、五研读作品,周五与周六下午创作实习。除了听课与讨论,读书、思考都是各自已屋。两人一屋。两年来,我作了听课记录20余本全16开本,日常见闻与思考又单有20余本16开本日记。所内有一批专职教师,除学员转的那几位,尚有蔡其娇、李又然、路工、石丁等。但许多重要课程,多是请外面的专家、学者来讲。我回想了一下,当时闻名的专家、学者差不多都来讲了课。加上文艺界领导人讲话与作家谈经验,总计大约有近百人。单第一学期讲中国文学的,就有郑振铎、聂绀弩、游国恩、黄药眠、冯雪峰、阿英、张庚、胡风、李何问、吴组湘、冯至、严文井、光未然、陈涌、王瑶、刘芝明、茅盾、林默涵、邵荃麟等。郑振铎讲古典文学,聂绀弩讲《水浒》,都不拿讲稿;张庚讲戏剧有讲稿,还带着两个助手,讲到什么问题,助手接着写到黑板上;胡风讲鲁迅杂文,不在台上讲,在台下一排前面走来走去,讲了一整天又一晚上,一直保持着激动的状态;柯仲平谈诗创作,时时抖动着胡子,像朗诵诗一样,充满了激情……

为了40多位学员的学习与生活,忙忙碌碌的教职员工也有百余人。担任行政职务的同志,除忙日常行政工作,有的也担负专门的课程。如教务处主任田家、副主任徐刚,就有主讲的政治课。他们是比学员付出了更多的辛劳。

个人阅读,进度有快有慢。当别的同学还在为《奥赛罗》中苔丝德梦娜的命运而感叹或为林黛玉的死而哭得红眼大鼻子的时候,我已经把全书读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散文讲农业那节不下两万字,我一翻而过。腾出的一些空隙,便钻研自己的“热点”。我细读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和一本英国人写的《诗歌源流》,以及伊萨柯夫斯基的诗与诗论。有的是别人的发现,成了一部分人的“热点”。当时苏联的文艺观点是我们必学的正统观点,但偶有新鲜见解传来,也能引人注意,如写《收获》的那位女作家尼古拉耶娃写的一篇《论文学艺术特征》,就引起了我们一些人的兴趣。我们似乎第一次从中听到了形象思维这个说法,知道了文艺特征还大有讲究,对搞创作,不知道是不行的。便在一个范围中钻研起来。这篇文章对我尤有很大的启发。我那本受过错误批判的《文谈诗话》一书,不少篇谈文艺特点;后来写的《文艺特点的探索》,又专谈这个问题,在《文艺报》发了一版。当时若再有些空闲时间,我就自己悄悄出去看电影和去东安市场逛旧书市,那两年的电影我差不多一个没漏地看了,逛旧书市也有不小的收获。所内除了本身日程,也还安排些时间让大家参加所外的某些活动。如诗歌组就参加了中国作协开的诗歌形式问题讨论会。我个人还参加了音协的歌词方面的一些活动。这期间,和音协的王建就成了长久的好朋

友。总之,两年间里里外外的学习与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大家觉得生活在天天有所得、天天有所充实的时光里。

我和缪文渭,是由华东文联介绍去的。1953年春,我正在山东莒南深入生活,接到通知后不久就去了北京。这时,第一学期刚结束,许多同学还没走,我得以多结识了一些朋友。自第一期起,所长是丁玲同志亲自担任,我去时还是她做所长。在教务处同志安排下,我与文渭去她住处拜见了一次,她像叙家常似地同我们谈话。她说不要恋北京,学习完了还是要到生活中去,作家就要在生活中;有人生活写空了还在硬写,四个钱做八个钱的买卖,没出息。“文革”中,我被戴的七八顶黑帽子,有两顶是和文讲所的学习有关,一顶是“周扬的黑干将”,一顶是“丁玲的得意门生”。上一顶,都知道我够不大了。第二顶,新时期见了有的老同学,他们笑说:“得意门生,你顶多沾个边——甚至连个边也沾不着,咱那期所长是田间啊,后来是公木、吴伯箫……”我说从受影响来说,也可以说是门生。学习期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时,学员们列席会议,我仔细听了丁玲的发言,她的一些话语我一直牢记;她来所内,辅导她的三个弟子时,小说组同志差不多都参加了,我这个诗歌组的也参加了,还仔细地作了记录。新时期,我将记录整理成文章,在天津《今晚报》发表,老同学邓友梅以致我信的形式写专文《难忘丁玲谈读书》,在《人民日报》发表,说:“想为你请功(只是一时不知向谁请)。



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插图 孙 奚 作



马来西亚(原马来亚)——盛产水果的大地。每当榴莲成熟上市的季节,空气中便会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芳香。我庆幸自己降生在这令人陶醉的国度里,然而我的童年却充满着泪水和痛苦的记忆……

人生第一课

1992年岁末,当我鬓角已染白霜,回到阔别了43年的第二故乡——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刚踏进堂兄家的客厅,第一眼便望见墙上悬挂着一帧陈旧的照片,那是战前拍摄的一十分珍贵的全家福,感情的潮水顿时涌动起来,眼眶便禁不住湿润了……照片前排慈祥的伯母膝前两旁,站着两个亭亭玉立、满脸稚气的女孩,那就是我的堂姐们。

“亲爱的堂姐,你们的灵魂可安好?”

猛然间,车轮急促的奔驰声,敌机俯冲的呼啸声、机枪扫射声、炸弹爆裂声、人们恐惧的惊叫声在脑际里阵阵轰鸣,把我带回那血与火的岁月……

“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风起云涌,日寇铁蹄疯狂踏进马来半岛,英军节节败退。当时,我仅四岁半。由于母亲半年前已回国探亲,父亲是新闻记者,早已奔赴前线采访,我便寄养在伯父家中。眼见日军逼近吉隆坡,伯父决定举家南逃到新加坡避难。大家庭分成两股撤离,祖父母、伯父母等老人乘坐小轿车南下,三位堂兄和两个堂姐便携我乘火车逃离。

那时,火车已全部被军队征用,运载的全是溃退的英军士兵和武器装备,异常拥挤,恰如当地人形容的“像个沙丁鱼罐头”,连车厢顶上都挤满了逃难者。幸好三位堂兄在二十岁,身强力壮,他们前拖后推,大家终于挤进闷热、空气混浊的车厢内,汗流浹背地喘息着。

列车启动离开了首都,快速向南飞奔。行驶了约一个小时,呜——当汽笛骤响,正在穿越茂密的橡胶园林时,隐隐约约传来的低沉轰鸣声渐渐增大。人们开始骚动,惊慌地议论道:“不好!敌机来了!”语音未落,刺耳的呼啸声从天而降,紧跟着便是“咯咯咯”的扫射声,人们惊叫起来。顷刻,火车来了个急刹车,巨大的惯性冲击得人东倒西歪,大呼小叫。

“下车,快下车!往树林里跑!”车厢外已经有不少人在奔跑,用英语、华语方言和马来语喊叫着。车厢内顿时骚动起来,大兵、难民前呼后拥向两侧窄窄的车门拥去,堵塞之状可想而知。求生的欲望已令人们失去了理智,只见一些士兵鱼跃般从窗口往下跳。三位兄长护着年幼的弟妹岂敢从窗户往外跳,只能拼死地挤向门外。

这条铁路路基较高,两旁是约2米深的壕沟,人们挤出车门便纷纷跌入沟内。此刻,数架敌机反复呼啸着轮番俯冲扫射、轰炸,此起彼伏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浓烟、烈火包围着列车。难民们惊恐万状地呼喊者,挣扎着往壕沟外爬,先行爬上去的已经钻进茂盛的胶园里,借助密实的枝叶隐蔽起来。

我们兄弟数人在身后的推挤下,也落入壕沟。三位哥哥矫捷地翻上壕沟,我人小身轻,被

二哥哥伸手一拉就上去了,他不容分说扶起我便冲进胶林。大约跑了几十米,我们钻进一座破牛棚,二哥护着我,全身伏在遍布牛粪的地上,哪里还顾得上脏臭。突然,空中传来尖利的嘶鸣声,令人毛骨悚然。二哥大约产生不祥之感,抱着我冲出牛棚,才跑出十来步,身后“轰隆”巨响,牛棚被炸得粉碎,强大的气浪将我们冲倒在地。二哥用全身紧紧地抱着我,久久不敢起身,被轰毁的树枝败叶落满周身。也不知道了多长时间,枪声、爆炸声渐渐沉寂,敌机遁去。

二哥先起身,忙将我扶起,边拍灰尘土边仔细察看。幸好,都没有受伤。他牵着我的手返回列车处。走近了,只见阵阵硝烟仍在飘荡,似

里新掘好的大土坑内,里面躺满遇难者的躯体,惨不忍睹。他们将姐姐们的遗体安放妥当,便开始掩埋。逃难期间,只能草草料理。大约是不愿给我留下悲惨的印象,掩埋一开始,二哥便匆匆将我领走。那时,我对死亡还不甚明白,竟傻乎乎地问:“姐姐什么时候回来?”二哥迈着沉重的步伐,过了一会儿才用沙哑的嗓音回答:“她们去的地方很远很远,回不来了!”我不明白那是什么地方,心中不免茫然。

列车损伤得不严重,抢修后便重新启动,载着劫后余生的人员奔赴到目的地。当我们一行疲惫不堪地来到家族临时住所时,几个哥哥

在榴莲飘香的大地上

□林阿绵



乎还夹杂着焦糊的气味。放眼望去,一片狼藉,四周人声鼎沸,寻找亲人的惊恐呼喊,面对死者撕心裂肺的哭叫,伤者沉痛的呻吟,混乱不堪。远处,英军士兵正在协助人们掩埋尸体。

我们焦急地呼唤着亲人的名字,四处寻找着。终于在一处塌陷的壕沟旁发现了两位兄长,他俩蹲着,泪流满面地望着沟底。我们跑前一看,惊呆了:两位姐姐面无血色,浑身沾满泥块倒在沟底。

“姐姐,姐姐!”我喊着要冲下去,被二哥死死抱住。只听大哥低声说:“一掉下去我们就给冲散了,等我们翻上沟已经找不见她们了。炸弹掉下来,我们只好跑进树林,没想到……”大哥泣不成声。事后才知道,由于日机的狂妄滥炸,壕沟塌陷时把大量土块倾翻到沟底,将一些年幼体弱者活埋窒息而死。这时,两位哥哥在士兵的协助下,将姐姐们的遗体抬到胶园

十分严厉地反复嘱咐我:“不要乱说话!不要说姐姐死了,记住了!”我感到事态很严重,只会连连点头。

老人们正焦急地在厅堂里等待着,看到我们进来,不见两个女孩,十分惊异,急切地询问。只记得大哥流称道:临出发前,红十字会来招募女护士,送回唐山支援抗战。她们俩爱国心切,当场就报名走了。

这意外的音讯令老人们震惊不已,显然似信非信,又无可奈何。过了一会儿,伯母将我拉到身边,轻声地问道:“姐姐到底哪儿去了?你告诉我。”我惶惶地望着她,又扭头看看哥哥们,他们都以紧张的神态盯着我。只听伯母又问道:“大哥说是真的吗?”我只好好地点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唉——”伯母长叹口气,显然对我很失望。

不久,我离开了伯父母的大家庭,回到父亲

神秘的饼干桶

我们在原始森林边缘的村落里安了家,开始艰苦的农家生活。

不久,坚守在密林里的抗日民族军便派人来与父母联络,希望他们协助开展文化宣传活动。作为一名孩童自然不明白大人们从事何种庄严的事业,只感到他们神神秘秘的。

这以后,就常见妈妈在农忙之余,拿出一些纸片摊放在桌上,边看边轻声哼唱着:“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达坂城的石头,硬又扁呀……”一只手还不时地打着节拍。

在那兵荒马乱的艰苦岁月,苦难多于欢乐,偶尔能听到妈妈的歌声,感到格外亲切。所以,每当此刻,我和年幼的妹妹总是静静地依在妈妈身边聆听,间或也跟着哼几句,久而久之,便能完整地唱下来。妈妈便轻声地告诉我们:“这是从唐山那边传来的,你们就在家小声唱,不要到外边去唱,记住了!”

在日寇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我已经懂得这种叮嘱的利害关系,所以对日本鬼子更增添了憎恨感。后来,当我返回祖国念书时,才了解到童年时偷偷学唱的歌,便是中国西部歌王王洛宾整理并创作的优秀民歌。世界任何角落,大凡有华人的地方便有这些动人情怀的民歌。

除了这些优美的抒情曲调,记得妈妈也不时唱出激昂的旋律:“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张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等到日寇投降,我们离开了乡间,重返吉隆坡时,我才从小学老师处知道:这些便是中国著名作曲家冼星海的不朽之作。我还依稀记得有首鼓舞民众抗日的曲子,头一句便是:“全马总动员,一起来抗日……”可惜其他词句都淡忘了。回到国内又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才知道是当年马来亚抗日志士借助国人的曲谱重新填词的抗日歌。

妈妈经过准备后,总是把这些歌片精心地折叠起来,用块布包好带在身上,这才抱起妹妹,踏过屋前的小桥,穿越茂密的玉米地,钻进无边无际大森林中的羊肠小路。后来我才知道,妈妈是到密林深处抗日志士的驻地开展文娱活动。

最令人关注的是家中那只方型铁皮桶,原是装梳饼干的,饼干早已吃完,便装些杂物,外面的花花漆皮开始剥落。自从妈妈参加日军宣

丁玲那次讲话,对我们那批人有很大影响,你的记录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极有价值,很可能是孤品。”田间继丁玲任所长,也是我的辅导老师,我得到他的指导、帮助,自然更不少。他看了我的一批作品,仔细谈了诗的艺术概括、提炼的问题,说我的诗是山上野花,但旁边有太多的杂草,把花掩盖了,要除去那些碍眼的杂草。

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文讲所两年学习,是一个重要阶段,是使我的创作由不自觉到自觉的阶段。在这之前,虽然写作已十年,实际上盲目性相当大,甚至在思想上还分不大清文艺与新闻、文学描写与理论阐述的界限。经过学习,在那么多专家、学者指导下,有那样的环境和条件,读了那些书——古今中外的名著差不多都读到了,这是过去或别的时候没有的机会和单靠自己读也读不明白的。明白了文艺是怎么回事,知道了中外文学史,知道了许多重要作家的情况和他们的经验,也便自然而然地总结自己,回顾以往,知道了哪些作品写好了是怎么写好的,没写好又是为什么没写好的。这个总结,便也自然给今后带来了自觉。使自己在从事文学事业中有了个坚定性,能够不受一些“风”的纷扰或受了纷扰也能够分析的一种坚定性。在文学上,经过“科班”和不经“科班”是不一样的。都说不上大学一样当作家,那是因为文艺是写生活,作者也可以自学成才,但能够“上大学”,还是上好。我是终生得益。

传工作后,她便不许我们再碰它。每次妈妈从密林中回来,一进屋里,便把大门轻轻掩上,然后从橱柜里取出饼干桶,将带回来的宣传品,包括那些歌片细心地置入桶内,盖牢后严实地藏到橱柜里。那时妹妹才两岁,一见了这只桶,便会伸手去抓,还喊着:“饼干!饼干!”妈妈便会叫我:“把妹妹抱走,拿块番薯给她。”

妈妈如此关爱这个普通的饼干桶,使我对它产生了神秘感,心想那里收藏的物件一定十分珍贵。一天,妈妈十分严肃地对我说:“那个铁桶里装的东西很重要,你千万不能动,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万一鬼子兵来搜查,你一定想法子把它藏到野外草丛里,千万不能被他们发现,懂吗?”我虽然并不懂得抗日军严守机密的纪律,但从小种下的对日寇的仇恨使我理解父母亲的行为,他们一定是在做打跑日本鬼子的事情,我没有多说话便深深地点着头。

有一天深夜,全家人都进入梦乡。突然,远处传来的阵阵枪声把我们惊醒。父亲从床上跃起,冲出门外观望。片刻,他回来对妈妈说:“镇上火光冲天,可能是敌人来了,我再去探探,你快把东西藏好!”言毕,他弹起一根硬木棒匆匆出了门。

“阿绵,快把饼干桶拿出来!”说着,母亲已经下了床,显然是要去藏铁桶。但这时,妹妹却呜呜地边哭边叫:“妈妈,妈妈,我怕!我怕!”妈妈忙抱起妹妹哄着。这时,我已取出铁桶,忙说道:“我去藏桶,你哄妹妹吧!”“外面很黑,你不怕吗?”“不怕!”话音未落,我已冲出家门,向后院跑去。

远处枪声仍不断,大火烧红了半边天。但我家四周却是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天上虽有稀疏的星光,根本照不见道。平时我确实怕黑暗,尤其是走夜路,因为此地蛇格外多,所以平时家长也不许我独自走夜路的。但这天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毫无反顾心屋,我把饼干桶牢牢地抱在怀里,快捷地穿过屋后密密匝匝的玉米地,碾得玉米地稀里哗啦啦。大约跑出200米的路程,才踏入地界外高高的灌木丛中。我选择了一处自认为隐蔽的草丛,把饼干桶藏在我里面,并留心做了标记,以便能及时找到它。处置妥当后,我急急地往回走,这时才感到心“嘣嘣”地乱跳,也不知道是兴奋还是后怕。

回到家,妈妈抱着小妹,手里提着一包衣物正在门口迎接我:“藏好了?”我连连点头:“放心吧!”妈妈欣慰地笑了。

远处的枪声渐渐地疏落,我们焦急地等待爸爸的音讯,以便决定是否也逃到密林里去躲避风,以免遭受日本兽兵的残害。

在忐忑中度过了下半夜,临到拂晓时分,爸爸回来后才知道,鬼子原本是来扫荡抗日军的驻地,由于抗日军掌握了情报,早有埋伏,把进犯的敌人狠揍了一顿,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过了一天,大家觉得事态平静了,妈妈便让我去取回饼干桶。当我完好地把这个神秘的饼干桶交回到妈妈手中时,一旁的爸爸高兴地夸了一句:“阿绵,你懂事了!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我心里甜滋滋的,这是对我最好的奖赏。